

第一章 2003 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

一、2003 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一）统计样本的选取

2003 年我国发表的经济学研究论文相当庞杂，数量巨大，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论文都搜集起来进行统计，从中找出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从总体而言，反映我国经济学研究前沿和水平的论文应该主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但是，核心期刊的确定也有不同的版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版本。这些版本选取的期刊存在较大差异，但我们发现在中国人民大学选取的核心期刊中，第一等级 A 类和第二等级 B 类期刊基本都被选为核心期刊。这样，我们就把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 A、B 类核心期刊（发表经济类文章的）作为统计样本。这些期刊见表 1：

表 1 中国人民大学 A、B 类核心期刊（与经济类相关）

A 类	B 类
中国社会科学	求是
新华文摘	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
	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
	财贸经济

续表

A 类	B 类
	经济学动态
	世界经济与政治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复旦学报（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教学与研究

当然，以上样本的选取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2003 年作为尝试，在今后各年选取时我们将逐步加以完善。

（二）2003 年中国经济研究的前 20 个热点问题

2003 年在以上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全部经济类论文共计 1 775 篇，我们对这些论文进行了逐一分类统计，得出了 2003 年经济学界讨论的前 20 个热点问题。前 20 个热点问题的排名以及各热点问题发表的论文数目和在所有论文中所占比例情况见表 2。

表 2 2003 年中国经济研究前 20 个热点问题

位次	热点问题	篇数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1	资本市场问题（含上市公司、资产定价等）	150	8.45
2	三农问题（含城市（镇）化）	69	3.89
3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	68	3.83
4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问题（含产业集群、新型工业化）	63	3.55
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含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工业基地）	51	2.87
6	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问题	41	2.31
7	商业银行问题	38	2.14
8	财政政策问题	34	1.92
9	经济全球化问题	34	1.92
10	转轨经济问题	33	1.86
11	信息经济问题（含新经济、知识经济、信息化）	32	1.80

续表

位次	热点问题	篇数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
12	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	28	1.58
13	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	27	1.52
14	公司治理问题	24	1.35
14	货币政策问题	24	1.35
16	社会保障问题	23	1.30
16	消费问题 (包括消费市场、消费经济等)	23	1.30
18	宏观经济形势问题 (含世界经济形势)	22	1.24
19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21	1.18
20	东亚经济问题	19	1.07
	合计	820	46.2

从表 2 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经济学讨论的主题相对分散。首先从总体上看,前 20 个热点问题的总论文数 1 775 篇中所占的比重仅为 46.2%,不足 1/2,论文主题集中度不高。从每个分类主题来看,在前 20 个热点问题中,即使是排在第一位的资本市场问题,也仅仅占 8.45%。这种现象说明,一是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趋向规范、独立和成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学术氛围在逐步形成;二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提出为我国经济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舞台,从而使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我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发展,使一流的研究成果主题趋向多样化;四是核心期刊的定位追求差异化,这就使论文的选择不像以往那样跟风去讨论大家都关注的同一问题,而是注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各学派对各种问题的各种观点,通过期刊这样一个渠道表达出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理论展示平台。

第二,经济研究面向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战场,注重用理论解释实践,或用实践检验、修正理论和提升理论。综观前 20 个热点问题,可以发现这些热点问题基本上都属于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期。面对这两个转型,我们既无现成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也没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作参考,摆在中国经济学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

在已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战场，对现实问题进行总结、提炼，以形成理论，或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前瞻性探索。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或者说在世界经济学舞台上的话语权，就在于对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解释，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已有经典理论的验证、修正和创新。

第三，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在我国现阶段，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是为所有经济学科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方法和范式，这方面的研究不可忽视。因此，加强基础理论专题的研究，需要经济学者的努力，更需要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三）2003 年中国经济研究的前 20 个热点问题分析

在前 20 个热点问题中，关于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上市公司和资产定价问题）在所有论文中遥遥领先，成为 2003 年的第一热点，其论文数量是排名第二的三农问题的两倍多。直观来看，2003 年的热点问题——资本市场一直都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而三农问题、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区域发展问题、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问题、商业银行问题、信息经济问题、东亚经济问题等明显与前一年度讨论的热点表现出不一致，这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有直接关系。财政政策问题自从 1998 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就一直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它和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另外，前些年非常热的公司治理问题相对于以前也沉默了不少。

资本市场问题排名高居第一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股市两年来的低迷，使中国资本市场不断趋于边缘化，从而与其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严重不相称，拯救中国资本市场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热点。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学界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在 2003 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利用一定篇幅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规划和部署，2004 年 2 月，中央再次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和稳定发展的 9 点意见》。这些历史性文件的形成，应该说是吸收了资本市场研究的积极成果，它必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经济学研究

与政府政策制定的互相影响，说明了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成果也是相当巨大的。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毕竟刚刚发展了十多年，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迅速发展的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牵涉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这就使资本市场必然成为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资本市场不仅仅是2003年经济研究的热点，近几年来对其的讨论热度一直不减，这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反映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从商品市场向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深化。

三农问题凸显出来成为2003年第二大经济热点问题，表明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农村居民消费对整个社会消费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农民市民化的转移速度缓慢，使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错位；大量农民滞留农村，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因此，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积极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我国相继出台了许多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具体政策，如2003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另外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现在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三农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三农问题成为2003年度的第二大热点，显示了理论界顺应实践发展的要求，积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总量拉动转到了结构推动的新阶段。在经济发展的这一新阶段，经济结构的优化，就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以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经济社会结构、人与自然的结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结构的统筹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五个统筹大多都成为了2003年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中的城乡结构表现为三农问题，排名第二。区域统筹表现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西部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排名第五。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不仅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相关，而且还与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的结构统筹相关，排名第九。社会经济结构的统筹表现为信息经济问题，

括新经济、知识经济、新型工业化等的讨论，排名第十一。可见，五个统筹发展的结构优化问题都包含在 2003 年前 20 个热点问题之中。

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从而产生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出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依据 WTO 的规则调整产业政策，以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处在迅速的调整过程中，中国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和政策的安排，从而保证中国能够有效地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及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嵌入到发达国家的产业链条中，使中国的产业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比较优势理论也需要重新做出审视，竞争优势理论中的产业集群概念，进入了人们视野，成为关注的焦点。三是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必须结合信息化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问题的讨论就高居第四位。

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今天我们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核心问题还是发展，只是用“科学”加以约定而已。如果忘了发展，科学的发展观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 2003 年的热点问题中高居第三位。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说，以上所有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最终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2003 年中国经济前 10 大研究热点问题综述

（一）资本市场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在 2003 年所有热点问题的研究中位居榜首，充分显示了资本市场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2003 年

对于资本市场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本市场的效率可分为外在效率和内在效率，所谓外在效率是指资金分配效率，即价格能否充分反映信息的变动；所谓内在效率则指资本市场的交易效率，即资本市场能否以最短时间和最低交易费用为交易者完成一笔交易。

在资本市场外在效率的研究方面，张兵、李晓明采用时变系数的 AR (2) 自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波动集群”的异方差影响这一特别适合于转轨经济体中新兴股市的渐进有效性检验，发现中国股市从 1997 年开始收敛于弱式有效。

陈梦根通过引入修正 R/S 分析与 ARFIMA 模型对中国股市长期记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代表股票市场总体的股价指数不存在长期记忆效应，而个股收益序列的分布特征存在着较大差异，仅少数个股存在长期记忆行为，说明中国股市总体上仅达到弱式有效。

贾权、陈章武利用中国股市的数据对基于市场有效假设的 CAPM 模型以及其他因素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市场 β 值与收益率呈现出与 CAPM 模型预测正好相反的负相关关系，而且流通市值、市盈率、账面 / 市场价值的比率等其他因素对于收益率也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股市不满足市场有效性的假设，投资者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高峰、宋逢明利用中国股市的调查数据，对机构的预期行为进行了直接的检验，发现中国股市理性预期的假说并不能成立，参与调查的机构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还不够高，即使是滞后一期的收益率中的信息也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这间接说明中国股市至多仅达到弱式有效。

刘煜辉、贺菊煌、沈可挺的研究发现，中国股市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存在短期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这说明中国股市远远未达到半强式有效的状态。

在资本市场内在效率的研究方面，曾长虹研究了证券交易机制对股价方面的影响，曾认为按开盘价和收盘价计算的两种收益率中出现的极值聚集现象无法用交易机制的差异进行解释，他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市场中涨跌幅限制的存在。然而在不存在涨跌幅限制的条件下，按开盘价计算的收益率序列方差与按收盘价计算的收益率序列方差存在明显的差异也

不能作为交易机制对股价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据，因为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别不能确定究竟是由无交易时段的存在造成的，还是由于交易机制的差异造成的。

范南、王礼平研究了我国印花税变动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印花税上调会导致市场收益波动性的提高，印花税下调则会导致市场收益波动性的降低，因此，为降低市场波动性和噪声波动性，政府应进一步下调印花税税率，以促进市场效率。

2. 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

在理论研究方面，于春海、雷达分析了西方新古典主义资产定价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及一般特点，发现 Arrow 的随机贴现思想奠定了资产定价理论的一般逻辑，经过资产组合选择理论、CAPM、ICAPM 和 CCAPM 等定价模型的补充和发展，西方资产定价理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戴金平、李治将资产定价理论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类进行比较，发现以精确的数理模型为基础的演绎法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正逐步趋于完善，而由于现实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特征也使得以技术分析为代表的归纳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行为金融学和成交量驱动的股价序列模型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两个重要的新发展。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相互融合，代表了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方向。

在实证研究方面，何旭强、吴科春等人的研究发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揭示的风险收益关系在我国股市并不显著，从趋势上看，无论个股还是行业系统性风险占整体风险的指标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陈守东、陈雷、刘艳武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及 GARCH-M 模型对沪深两市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沪深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并且都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

廖理、汪毅慧在借鉴国际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水平进行全面的测算，在克服样本数据太少和无风险利率水平难以确定的基础上，估计出中国的风险溢价水平为 6.38%。

朱世武、郑淳采用经验分析的方法较全面地分析了近 8 年来中国市场的股权风险溢价，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名义收益下的股权风险溢价为 2.03%，引入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收益下的股权风险溢价为 2.11%。

3. 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资本市场规制、监管和信息披露机制等对公司的外部治理产生影响。

汪辉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债务融资净额仅占总资产的 2% - 3%；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债务融资可以在缓解股东与代理人冲突、减少代理成本，减少公司自由现金流以约束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传递信息等诸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吴晓求认为，在中国现有的资本架构下，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前者包括股权结构、股东结构、激励机制等，后者则包括行业的周期性及其市场竞争程度、控制权市场和债券人市场的形成等，这些因素与公司治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郝旭光、黄人杰认为为弥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必要引进独立董事制度。

于东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并不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市场化选择的董事会规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董事强制持股并在任期内锁定的制度有助于董事关注股东价值。

4. 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许崇正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正悄然促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化，然而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基本没有考虑股票市场因素的作用，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高度关注资产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的变动，并注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建立货币政策对股价波动的反应机制；重新界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协调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

裴古、熊鹏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大量货币不是被传导并作用于

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实体经济环节，而是“渗漏”到股票市场“漏斗”和银行体系“黑洞”，其效应构成了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反制力量，为此必须有效抑制“渗漏”效应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孙华妤、马跃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并着重对中央银行干预股票市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市市值与 GDP 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不连贯（时有时无）、不正常的（比如存在泡沫时可能表现出负向关系，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央银行对股市的态度只能是关注而非盯住，货币政策的机制只能是“斟酌”而非“规则”；就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和目前现状来说，它尚且不能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仅想干预股价，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冯用富分三种情形讨论货币政策是否能对股价的过度波动做出反应：

- （1）完美市场中的资产选择模型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股价没有高估或低估的情况，市场完美的调节机制不需要货币政策的干预；
- （2）完美市场约束条件修正后的资产选择模型表明，在信息费用的约束下（信息费用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小化），一是市场自身有纠错的功能，二是央行干预的种种前提不成立；
- （3）中国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选择模型表明，股市高的预期收益率主要由高的风险报酬和高的交易成本所抵补，利率调节对股市上升中的高收益率和下跌中的深度套牢没有任何影响，货币政策干预股市过度波动是无效的。

5. 资本市场的监管

徐经长认为针对当前上市公司的会计失真，尤其是蓄意的会计造假行为，应当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会计监管体系。从可操作性出发，目前我们应着重关注那些造假手段恶劣、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重大的交易和事项，如伪造原始凭证、直接虚报利润、隐瞒重大事项、违规变更会计政策、信息披露不及时等；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关注上述交易和事项背后共同的、有规律性的现象，如盈余管理、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等。

平新乔、李自然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虚报问题，乃是由上市企业的真实质量所致，打击、查处中介机构只是治标，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才是治本。在上市公司质量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若证监会按经验估计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均值来确定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格，则危险很大，它反而会增加虚假的信息披露频率，因而证监会应该放松对再融资

资格的监管。

计小青、曹啸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现有的各项制度安排是一项具有造假激励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选择进行虚假财务呈报是其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不管我国目前财务呈报管制措施在形式上多么完善，如证监会出台了系列会计信息披露格式规范，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制定机构不断提高准则质量、完善准则体系，政府推动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以增强其独立性等，财务呈报管制无效也是必然的，这是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为提高我国证券市场财务呈报管制的效率，证监会应当转变监管理念和监管职能，从全面管制转变为重点进行财务呈报管制。

傅艳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加入 WTO 的形势下，中国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的协作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基于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及其境内外证券监管协作的特点，中国应从建立和完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拟定和实施协作的工作程序、赋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执法权利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四个方面来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协作。

6. 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林涌、王力认为新股的发行方式和发行定价方式作为发行制度的基础，对资源有效配置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为了纠正市场机制的扭曲，平衡发展一、二级股票市场，应当进一步推进股票发行定价的市场化进程，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竞价发行定价。

蔡则祥、王家华认为 QFII 于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促进新兴资本市场向成熟资本市场转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如果 QFII 制度设计不当或 QFII 实施的环境建设不到位，有可能制约 QFII 对资本市场转型作用的有效发挥，甚至产生负效应。为此，我们应在法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培育蓝筹股群体、培植券商实力等方面加强建设。

刘加在客观描述中国证券公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证券公司进行制度创新具有必然性，当前应从产权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加强证券公司的制度创新。

李富强、董直庆认为当前我国股票市场上以政府为单一的制度创新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创新可能由于个体行为或效率差异而出现不稳定均衡，因而我国股市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应从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转化为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李锋认为金融控制与风险化解的动态组合是我国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一条主线，因而可以用金融控制与风险化解假说来解释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从这个角度来探寻我国资本市场的出现及其变迁，不仅有利于从总体上准确了解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管理、规模、结构和整个运行机制的特点及存在的局限性，而且能够有助于把握其今后发展和完善的趋势。

（二）三农问题研究

农业和农村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过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已是全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这也正是三农问题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我们搜集的文献来看，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论述的。

1. 农业

主要论述了农业发展（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国际）竞争力（涉及粮食市场化改革和粮食安全问题）、农地承包经营权（产权和土地流转）、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粮食流通市场化主体建设），对农业保险等问题略有提及。

第一，农业发展问题。张雷声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发展上没能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从生产力方面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农业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农业充其量是一种生存农业。低下的农业生产率造成了单一、畸形的农业生产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应当从辅助型发展战略转向农业工业化发展战略。包括变革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政府对农业提供各种支持和扶植。

第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范新成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结构调整面临诸多难题：农产品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农民组织程度化低，农业技术装备不足，结构调整主体错位，政府失灵。因此，他提出了六项对策研究：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体制创新，政府职能准确定位；农业结构调整应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农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农业结构调整注意发挥比较优势和调

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而且，尹杰成认为，《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等为农业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国际性规则基础，农业资源的全球性流动与优化配置逐步加强，因此，要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等。

第三，农业国际竞争力问题。人世后，中国的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增强粮食的竞争力，加强长期的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成为核心问题。胡小平等对中美小麦的市场竞争力进行了比较，认为两国小麦的生产成本相近，但我国具有流通费用优势，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小麦可以在国内市场应对美国小麦的竞争。朱晶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对增强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竞争力的影响，认为以提高科研投入等农业生产公共投资增强我国粮食的生产和竞争能力是应对入世挑战和实现未来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选择。

第四，农地产权制度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周天勇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框架，即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并轨，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各级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力，实现较长期使用年限的财产权制度。俞海等对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同时，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蒋省三等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农村工业化调查基础上提出，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可以屏蔽国家征地制度，农地直接进入市场，实行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同地、同价和同权。针对土地流转问题，胡亦琴认为，土地的流转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提升了农业的科技含量，加快了农业的结构调整，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推进了外向型农业的发展。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胡亦琴提出了以下四种方式：土地反租倒包、土地有偿转包或转让、土地投资入股、土地信托服务和土地互换。阳国亮和何元庆又提出了一种流转方式即土地证券化。

第五，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农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罗必良认为，可供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选择的有效方式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前提，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企业化为

线索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张照新等指出，2002年起，安徽、河南等粮食生产区根据自身的特点，对粮食流通政策作了大的调整：在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的同时，对粮食企业实行新老库存划断，并调整粮食风险基金投向，按计税地亩或粮食亩数对农民进行补贴，起到稳定粮食购销、搞活市场流通、保护农民利益的效果。郭玮和赵益平提出，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应当建立有效的国家粮食信息系统和粮食安全预警体系，加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

2. 农村

重点是农村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的论述。另外，对农村家庭结构变动、乡镇组织行为和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问题也有所研究，但是比较分散。

张晓山认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三大主要资源的利用都受到制约，无法实现优化配置。其中，劳动供给总量过剩，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造成农民利益的流失；资本稀缺使农村劳动力很难和资本结合。因此，他提出了基于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措施。

在农村资本稀缺的同时，我国又出现了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退出现象，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提到了议事日程。张余文认为，解决农村的金融需求问题，必须求助于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之间的恰当结合。从正式金融安排方面着手，首先，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三农的特殊性，完全商业化的正式金融机构必然不能够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因此，主要为三农服务的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必须是“有限度”的商业化，即中央银行把中国农业银行的盈利性指标压低，以便于补贴其从事三农业务所带来的必要亏损；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设立专项贷款，作为支持中国农业银行信贷资金。其次，在充分发挥正式金融安排作用的同时，鼓励和发展符合国家法律规范的民间金融。

3. 农民

农民负担和农民收入是两个最重要内容，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负担问题。陶然等根据一项基于大样本、跨年度的实证研究对中国农村的税费问题进行了理论性概括，发现自1993年以来，各省

按总费计的负担都有所增加。总费用增加主要来自于教育费用（学费和其他教育支出，略大于学费）增加，而不是农业各税的增加。税费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反而变得严重的原因在于农村税费负担的累退性，其根源在于政府管制。胡万东也认为，农民负担重并不是农业税负担太重，而是农业税以外的因素即乡统筹和村提留等造成的。解决农民负担的财政思路是采用间接税为主，辅之直接税最可取。费改税必须与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的财政体制衔接起来，与农产品收购制度改革、理顺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农村政府机构改革、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结合起来。国风认为，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是农民负担不断膨胀的原动力；农村税收收费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农民负担沉重的催化剂；农村财政分配体制混乱，事权大而财权小；农村政府行为不规范，平均分摊的农村公共支出筹集制度给收入低的农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徐利军等认为，乡镇财政经费急剧膨胀，教育支出压力不堪重负等问题使得财政支出大于税费的合理空间，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乡镇财政支出改革（如降低公务员工资、完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等）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条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保证。

第二，农民收入问题。减轻农民负担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人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在于消除体制性障碍（城乡二元结构、现行乡村组织体制和户营经济的缺陷），加快城乡一体化，进行农业生产组织制度改革、创新和配套改革。王云坤以吉林为例，认为目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农民非农化程度低，增收的核心是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战略重点是突出工业拉动，实施途径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也是必须的。

对于农村组织的变革，程同顺等认为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上，研究者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应该提高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组织化。闫志民提出，要积极发展“企业+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股份制等社会化的农业组织，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生产。李达球也提出农业企业化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突破口。

另外，对农民的储蓄行为、农户兼业化道路和农民迁移意愿的分析也有所涉及。例如，在农民迁移意愿的研究中，王云坤通过抽样调查，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对农民和中小企业主的迁移决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农民个人迁移意愿的是个人特征、家庭、社会制度等因素，而影响中小企业主迁移意愿的因素包括迁移成本、现有环境和社会制度等。

4. 城镇化

城市化（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快城镇化发展，不仅要注重发展和经营城市，还要注重城乡的统筹发展，也要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潘胜洲指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刘奇葆也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农村生产方式变革滞后，其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业、农村的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相隔离，严重影响了工业对农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农业也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洪银兴和陈雯认为，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均质，其基本含义是通过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把城市和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交流与组合。王学仁认为，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城镇与农村产业的相互衔接，经济有效融合的良好互动和一体化发展，最终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功效。

上述文献对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的分析既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刘克菡等对我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非常全面的整体论述，将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纳入到他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业人口太多，农业就业不足，根源是工业化道路的偏差以及城乡二元体制。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推进多元递进的城市化战略，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吸纳富余劳动力的作用（城乡协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相互促进）；改造传统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培育市场主体；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农地制度，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建立多元金融体系，培育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流通体制改革）；改善政策环境（城乡一体化；税费改革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三）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

在我们统计的文章当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讨论非常多，而且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外贸易以及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本身的问题。其中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最为突出，不仅有诸多文章对该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而且有多篇是对该问题的文献综述。

1. 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这些文章就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理论或实证论述。邱询旻和孙刚对当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与讨论，他们认为，总的说来，金融发展可以降低风险、合理地配置资源、监督经理和实行公司治理、动员储蓄、促进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王志强和孙刚也通过检验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同时，中国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同时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陈柳钦和曾庆久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模型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易纲和林明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这些文章就金融方面的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探讨。林毅夫、章奇和刘明兴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以制造业为例，考察了银行业的结构和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两个主要的金融结构内容，研究结果认为，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机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要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涉及到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刘金全和谢卫东研究认为，在有些情形下降低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并改进社会福利状态，在有些情形